

编者按 近日,主题为“新格局下的共同机遇”的2011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在大连举行。500多名学界意见领袖及商界领军人物共同把脉世界及中国经济走势,探讨新格局下的经济转型。作为东北地

区最高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盛会,大连·中国经济论坛至今已走过3个年头。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本版特此聚焦年满3岁的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分享她的群星璀璨,也关注她的成长之感。

许小年——孤行是为了到达彼岸



“我说得新奇?都是旧的东西,只是你知道得少罢了!”、“让我吃饭(别跟着我)”。在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召开期间,许小年对媒体只说了这两句话,一如他一贯的风格,特立独行,孤傲冷漠,仿佛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茧。

但是,茧的下面可能就是血。在自助餐厅,许小年端着盘子转了两圈,才夹了两片面包、几根蔬菜以及两块咖喱鱼。在一个烤肉的窗口前,他终于停下脚步点菜,但很不巧,厨师很忙,头都没抬便回了一句“等会儿”。在旁人的“注目礼”中,许小年没说什么,转身离去。

这就是许小年。他从商场转战到讲台,又从经济研究到历史、人文研究;他曾是机构投资者评选的最佳经济分析师,却直言官方数字看不懂;他曾说,中国

不需要凯恩斯主义,需要邓小平理论;他还说,“我活在死后”。

他的眼光只在讲稿上

姗姗来迟,一如他参会的风格。从早上论坛一开始,许小年就“失踪了”,留下空空的座位,以及一张写有他名字牌子。许小年的演讲时间定在11时30分,是演讲的最后一个嘉宾,但直到11时15分,许小年才赶到会场。30分钟的演讲时间,许小年只用了20分钟,而且,在整个演讲期间,他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稿子。

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到演讲效果。几乎所有人都在饿着肚子聆听,没有人退场,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午餐时,有人议论:“讲得真好。”

其实,他讲得远谈不上好。在20分钟

的时间里,许小年念课文般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下去”的讲稿,这个稿子在两天前曾经在某专业财经媒体上刊发,几乎一字不差。而且,其观点依然是他近一两年来反复说过的“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需要邓小平理论”。这是他一贯的主张:拥护市场化,而对宏观调控意见相左。如果对他有更多一些了解,你恐怕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市场化也许将是

他毕生捍卫的理念。上世纪60年代,许小年曾经给母亲写过一封信,表达了对陕北农村贫穷的不解。当时,他在信中说,是陕北农民懒,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搞梯田。10年后,他说他明白了;因为那时没有走市场化。从此,无论是在“中金”还是“中欧”,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学界,他从没改变过自己的观点。

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论坛,多少显得有些不够尊重,但这就是许小年。有人不在乎形式,只要他露面,甚至不管他说什么,都愿意听。但也许有更多的人对他敬而远之。从散场到吃饭,几乎没有人与他交流,哪怕是礼节性的寒暄。

他活在内心的彼岸

今年4月,某财经媒体刊发了许小年的一篇人物报道,标题就是:彼岸许小年。但是,彼岸到底在哪里?也许只有他的内心才能作答。

“彼岸说”其实来自许小年自己。在他看来,能配得上这个尊贵词藻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尼采,另外一个孔子。孔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生前很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难于陈蔡之间’。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怎么能这么理解孔子啊,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点感

觉到了‘彼岸’的意思了。”许小年曾经说。尼采有一句名言:“我活在死后”,许小年也经常这样说。如此来看,在他的字典里,彼岸等于后世。

他的论调以及特立独行的方式让他拥有追随者以及反对者,他的反对者们在网络上斥责他“重理论,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食洋不化”。对此,许小年不屑一顾。他从不和反对派交流,他讽刺他们为“歌功颂德派”,简称“歌德派”。但同时,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他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教授”。在一次论坛上,当他做完一篇论企业家精神的演讲后,台下企业家集体起立长时间鼓掌。

对于他的长期争议,让许小年渐渐背上了一层厚厚的茧。早年,他曾经说,“经济领域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是有说话的自由,不幸是滥竽充数的太多。”而最近,许小年又说,“其实我有很多话没有说,不想说,是因为不想伤害别人。”曾有一位经济学家因为一番言论而引发轩然大波,许小年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不应该对人家这样的。”他甚至承认,“我(的观点)有一些过分。”

他更多选择用笔而不是嘴

在经历了长期的是非争议之后,如今的许小年似乎更多希望用笔来表达自己,而不是嘴。而博客就是他最好的阵地。

他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讲得越来越多,但博客的篇幅却越来越长。除了关注经济,他的博客内容也涉及到历史、人文。比如,他写下“从秦到清,不是封建主义”、“是重塑孔子雕塑还是孔子精神”。其文字之细腻甚至不亚于当代作家。在这些博文中,既有他的思想,也包含着对自己的审视

自怜。他甚至承认,自己是孤独的。

而一旦用到嘴,似乎没有一次不给他惹麻烦。2009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许小年让数百名中国记者感到尴尬。“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吗?是你们问的问题根本就不对!”但转过身,他便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谈笑自如,用英文对答如流,这让所有的中国记者感到深深的刺痛。

即便在演讲中,他的嘴似乎也没给他带来什么好的效果。在本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上,即便演讲是照本宣科,但许小年还是不经意地说出“保障房是大跃进”这样的话。

不过,关于许小年永不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段子,如今看来却像是以讹传讹。在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开幕前,许小年曾一度应允接受记者半个小时的采访,但最终还是又反悔了。记者曾与他的秘书有过一番交流,详细地阐述过采访想法。临行前,秘书告诉记者,许小年七八月份还将来一次大连,“我们提前联系,那时可以做一个专访。”

这也许是一句托词,但是否也在说明,许小年的内心并未外界想像的那般孤傲?或者说,孤的成分更大一些。当茧越来越厚,他也想出来透透气,他也不想想被人误读。

写过《吴敬琏传》的吴晓波曾说,“你不能指望一位经济学家‘永远正确’,也不能苛求他穷尽当代所有的困惑,然而,你却可以期望他始终保持清醒、自由思考的姿态,这是时代进步的一部分。”

也许,对许小年,也应该是这样的态度。

人物特写

论坛3年 还是“不及格”

第三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闭幕之前,我让执行主席宋金伦为论坛打个分。结果他说:“还是不及格。”

国人知道经济论坛是近几年的事情,要归功于达沃斯论坛和博鳌论坛。这两个论坛的火爆,引发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论坛经济。各地的论坛如同雨后春笋,一夜之间破土而出。这其中,也包括已经3岁的大连·中国经济论坛。

在资讯爆炸的当下,我一度不解,论坛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想了解某位学者或企业家的思想,微博、博客、专栏、访谈、视频……铺天盖地,又何必像学生一样坐在台下用笔记。然而,通过论坛,我似乎又找到了部分答案。

这并非学术界的经济探讨或企业界的经验交流,这既是多元化与多向度的思想展示,又是学院派与实践派的零距离对接。有争论、有交锋,也有英雄所见略同下的惺惺相惜。创新、走出去、寻找向上的力量,这是思想的交集,而经济学家偏重宏观大势的分析、企业家侧重于战略的选择,这又是差异。

比如,学者中,卢中原关注于问卷调查下的企业战略;樊纲重点分析今明两年国内外经济形势;许小年阐述了宏观调控未来的发展与走向,这些观点代表了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意识与精神。而作为商界精英,王健林阐述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柳传志分享了金融危机下的人才观以及祁玉民关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牛鼻子”理论,无疑凝聚着业界向心突击的勇气与智慧。

而正是论坛这一平台,让共识与差异得到最大化的体现,让思想碰撞出火花。这种氛围、气场所营造下的思想张力,又岂能是某一种媒介以某一种表现形式所能取代?

所以,我们看到了台下那一张张热切而专注的面庞。这很像是一种抱团取暖,又像是在相互感染。就如同演唱会的现场版,你的情绪会被现场的氛围和周围人的情绪所引

爆,甚至无法自己。这绝不会等同于端坐在家里看电视、听CD,因为前者是用全身每一个细胞在看、在聆听,而后者则是眼睛与耳朵在忙活。虽然,他们只能看与听,但无疑,台上的学界意见领袖以及商界精英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对话中国”的价值样本,终有一天,他们也要、也必须走上这个舞台。

但是,是否又需要那么多论坛呢?曾经有人质疑,既然已经有了一个达沃斯,已经有了一个博鳌,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的论坛在各地生根发芽。为此,有人说,“这就是中国式的跟风与效仿——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也必须有。”

然而,跟风也好,效仿也罢,事实证明,中国还真需要多一些这样的论坛。毕竟,一个达沃斯只能让有限的中国企业家去参与这场思想盛宴,只有更多的优秀论坛的涌现,才能让更多的企业家吸收到思想的营养。宋金伦并不否认花钱来参加论坛的企业家们并非都是为了学习,“达沃斯还有一个结交生意伙伴的功能,博鳌如今一票难求,谁敢说参加论坛的企业家没有学习以外的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存在即合理,合理的需求就有市场。

至于宋金伦说的“不及格”,言外之意也在于此。大连·中国经济论坛能像达沃斯那样商机无限吗?至少目前不能;能像博鳌那样让参会企业倍感有面子吗?显然现在也不及。包括思想的营养,也相差甚远。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一整天只有3个平行论坛,而3天的达沃斯有上百个。从“我给你吃嘛你就吃嘛”到“你想吃嘛我给你上嘛”,这是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

所以,宋金伦说,以后的论坛时间上要从一天变成两天。我希望这并不只是规模的扩大,而是从“不及格”到“及格”的真正转型。

论坛观察